

胡正荣 李煜 主编

社会透镜

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

1949—2009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媒介发展研究：传播学前沿理论方向建设”成果

社会透镜

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

1949—2009

胡正荣 李煜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透镜：新中国媒介变迁六十年：1949～2009/胡正荣，李煜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302-21934-7

I. ①社… II. ①胡… ②李… III. ①传播媒介—新闻事业史—中国—1949—2009 IV. ①G219.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7058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240 印 张：32

字 数：579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48.00 元

产品编号：034205-01

序言

盛世修史的时代,让媒介的纪录在当下有了特别突出的意义。共和国 60 年的历程,或波澜壮阔,或暗涛汹涌,媒介的亦步亦趋使得这段历史可能有机会“重播”,然而,作为那个充斥着改变和永恒的时代的记录者,我们该如何记忆?我们的记录或编辑,如何能穿越时空,经历历史真实的淬炼,留给后来者……

我们首先要保持客观,但是客观就要具体,往往抽象容易主观。在这种具体的叙述策略中,我们选择了一种“故事”意义的历史叙述:从延安到北平,新华社国家通讯社的建立有太长的前传与后记;之后,《人民日报》先放“卫星”,点燃了革命激情,但是盲从之风将人们引进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中;“文革”的序幕被《两报一刊》赫然拉开,正剧的舞台上上演的是一出反讽、反智的闹剧;媒介有幸,终于开始回归理性,“真理标准”讨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坚持常识常情成为下半幕的主旋律,引发出系列台、都市报……在民生化、全球化、娱乐化的主题下媒介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性的互动与变奏,高歌猛进略显夸张……这些片断的选择,不求完整,但希望能在历史断层处折射历史的本真。

再有,我们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自说自话。媒介发展的 60 年,不是仅仅停留在报刊的版面和磁带光盘上的声光音画,我们以为这不过是社会发展的一枚枚透镜,其折射的是国家发展的起承转合,投射的是人间正道的沧海桑田。媒介发展的崎岖之路,或康庄大道都不会是自我言说的过程,这里可能既有内政,更有外交。1950 年代舆论高调反对美帝苏修,90 年代香港回归的连续直播,更有新世纪大国崛起中奥运期间新闻制度的空前宽松。媒介功能的逐渐丰富、完善和深化,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潮流的互动,使得这样的媒介记录真正地具备了“昨天的新闻,今天的历史”的功能,我们有责任将这个历史还原。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尽管是学界中人经年思考所著,但是在行文时却追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这里的价值体现就在于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彼此体认。学术性表现在我们观察历史的角度与叙述历史的方式,大众性则在于对众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的媒介观照,其价值来源于学

术，但并不囿于学术。

本书的完成，主要由胡正荣教授组织、策划、审读，李煜对全书框架和文稿进行了统筹和校阅，各章节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编 李煜 黄玉

第二编 谷艳梅 赵国红 姬德强

第三编 唐晓芬 李冰

第四编 王肖邦

第五编 王延辉 杨柳 阎玺

将共和国媒介 60 年的发展，放置于中国现代化之路近 200 年的历史绵延中，在这三分之一的历程中，有太多可圈可点，值得解读的内容，无奈著者学识有限，史识浅陋，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有幸得到学界前辈陈崇山老师、李金铨老师指点迷津，魏永征老师答疑点拨，更有学界同仁张磊、柯妍、黄华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疏漏与不确，概编者之责。

2009 年 8 月 29 日编者谨识

目录

【第一编】 建国(1949—1956)

第一章 从延安到北平	3
第一节 新华社：进北平建立国家通讯社	3
第二节 国家的声音：“开国大典”	9
第三节 《人民日报》：徘徊在学习与探索之间	16
第二章 政治协商的舆论通道	26
第一节 民主人士的言论平台：《光明日报》的创办	27
第二节 《大公报》的改名与停刊	32
第三节 陈铭德、邓季惺：《新民报》何时复刊？	36
第三章 舆论阵地初掀“龙卷风”	40
第一节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40
第二节 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	46
第三节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49

【第二编】 曲折(1957—1966)

第一章 大跃进：媒介成为放大器	57
第一节 风向突变：从整风到反右中的媒介调适	57
第二节 “卫星”上天：媒介成为放大器？	82
第二章 舆论高调反对美帝苏修	102
第一节 尴尬中苏：媒体成为舆论阵地	102
第二节 舆论高调反对美帝苏修	113

第三章 山雨欲来：媒体摧眉折腰 118

第一节 文艺批判中的媒体记忆 118

第二节 “浩劫”前夜：媒体摧眉折腰 129

【第三编】 浩劫（1966—1976）

第一章 “两报一刊”大批判 145

第一节 “大字报”：批判的武器 145

第二节 夺新闻界的权 149

第三节 造反有理 155

第四节 “揪军内一小撮” 159

第五节 批林批孔 161

第六节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64

第七节 “四人帮”的强弩之末 165

第二章 样板化的精神世界 168

第一节 毛主席语录 168

第二节 “小报看（抄）大报，大报看（抄）梁效” 174

第三节 八个样板戏 176

第四节 一个作家 181

第三章 暗夜的火光 183

第一节 “皮书” 183

第二节 从手抄本到潜在写作 187

第三节 呐喊：天安门诗抄 189

【第四编】 探路（1977—1992）

第一章 思想解放 回归常识 195

第一节 光明初现：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5

第二节 春天来到：读书的禁区待打破 201

第三节 乍暖还寒：《苦恋》惹出风波 205

第四节 人生追问：“潘晓”的一封来信	211
第二章 媒体开始“谈情说爱”	216
第一节 人性回归：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	216
第二节 世俗还潮：《乡恋》惹出风波	218
第三节 青睐港台：1984 年春节联欢晚会	223
第三章 “事业单位 企业经营”	228
第一节 《市场》创刊	228
第二节 珠江模式：广播行业的突围	233
第三节 广告重现	237
第四节 《南方周末》创刊	242
第四章 媒介还有监督的本职	246
第一节 从“批评报道”到“舆论监督”	246
第二节 电视增加政治透明度	254
【第五编】 崛起（1992—2009）	
第一章 技术发展鼎新革故	259
第一节 报纸：“山一程，水一程”	259
第二节 广播电视：“轻舟已过万重山”	262
第三节 互联网：“直挂云帆济沧海”	268
第二章 体制突围春风化雨	275
第一节 思想解放的宣言书：东方风来满眼春	275
第二节 “我是谁？”：传媒再定位	281
第三节 集团化浪潮风起云涌	287
第四节 “二重奏”：媒介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	294
第三章 传统媒体扬帆远航	300
第一节 内容为王：一代人有一代之追求	300
第二节 形式也是内容	332

第四章 新媒介时代的来临	342
第一节 从商业网站到“自媒体”的跨越	342
第二节 媒介融合下的传播格局	356
第三节 网络媒体的“罪与罚”	367
第五章 舆论监督破浪前行	371
第一节 《焦点访谈》：一个社会守望者	371
第二节 “南丹矿难”：媒体首先“亮剑”刺破黑幕	375
第三节 “孙志刚事件”与一部陈规的作古	379
第四节 激荡的“公共事件元年”	383
第五节 从“俯卧撑”到“躲猫猫”	391

尾声

附录

新闻与社会：敢问路在何方？

——专访著名新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甘惜分先生

淡定中的历史钩沉

——专访著名新闻史学者丁淦林教授

新闻改革：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专访著名新闻学者孙旭培教授

传媒变革：何处是归程？

——专访知名传媒学者喻国明教授

亲历“大跃进”报道

——专访新华社高级记者方隍

理性、建设性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共识

——专访著名报人、《中国周刊》执行社长朱德付

现在是广播人最大大有可为的时代

——专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委、“中国之声”频率总监史敏

民主已经更具体，媒体应该思考自己该做什么

——专访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评论员白岩松

网络将更多的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是媒体

——专访新浪网总编辑陈彤

第一编

建国

(1949—1956)

从延安到北平

第一节 新华社：进北平建立国家通讯社

1949年3月，当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国共产党即将从之前的在野党变成执政党。共产党如何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和战后残局，又如何面对解放初期各种怀疑之音、不同观念，使国家摆脱长年战争的创伤，开展经济建设，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显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为迫切的任务。同样，创建于江西瑞金的新华社，如何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从革命根据地通讯社变成统一的集中的国家通讯社，也是新华社面临的新“考题”。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华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其间，新华社从小到大，逐步发展，除总社在延安外，还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依托当地党报建立了分社组织，成为了解放区新闻事业的中心和枢纽。此后，各个地方的新华社组织实际上是各个地方报社的采访组织。在解放战争中，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新华社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总分社，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分社，在解放军中也建立了总分社、分社或支社。1949年，新华社总社随中共中央迁入北平之后，情况开始了改变，新华社同报社分家，成立了自己的单独工作机构，这样就为建立统一的集中的国家通讯社创造了条件。

1948年5月，新华总社自太行迁到西柏坡之后，就在中央负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党中央为了加强对新华社的领导，同时为了严格训练新华社的干部，抽调部分业务骨干组成编辑部，在胡乔木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编发了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口

语广播、英文广播的主要稿件。这段时间，新华社集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工作于一身，出色地完成了宣传任务。经过严格的训练，提高了新华社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新闻业务水平，为新华社迎接全国胜利和事业发展做好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自创建以来，新华社就一直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是党中央进行舆论斗争的重要武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经常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修改重要社论和文章。战争期间，毛泽东每天为新华社写两三篇稿件也是常有的事，堪称新华社“级别最高的记者”。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播发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重要名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周恩来历来关心、支持新华社，对新华社的工作给予全面指导。他用口述的办法帮助记者撰述文章，在新华社历史上很少有，史称“说稿”，被传为佳话。他还替新华社想到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新华社记者的署名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新华社大批记者采访报道发稿后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所以也不知道当时写了什么稿子，因为当时写稿不署名。就这个问题，周恩来指出，外国记者报道都用本人名字，我们自己的记者是否也可以在报道中署名？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开始可以用集体名，因为稿子是集体写的，一个名字用开了就好办了。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名记者、名编辑。

一、战争中时常与报纸合而为一的“土”通讯社

在延安，新华社是地地道道的“土”通讯社：房子是“土”的，办公、住宿都在窑洞里；设备是“土”的，砍几棵树干立起来，再拉上几条电线就成了收讯用的天线，一部分收讯机也是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零件自己动手装配成的；人员是“土”的，报务员大多数是从白区来的苦孩子或陕北的放牛娃；抄收电讯的办法也是“土”的，报务员头戴耳机静听手抄。^①

这土法上马的通讯社，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成立，呼号CSR（Chinese Soviet Radio），开始对全国开展新闻电讯广播，这标志着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新发展。艰苦的创业环境，使红色中华通讯社一开始便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

^① 孙宝传：《走向世界的历程——新华社通信技术建设的历史回顾》，载《中国记者》，1991（12），13～16页。

华》报合而为一,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既编报纸,又编通讯稿件。

1933年3月,红中社建立专门的新闻收报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和少量外国通讯社的广播,并逐步发展了通讯员网。这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新闻电台。在红军开始长征前,这座新闻电台一直设在瑞金县下肖区的一座破庙里。

1934年10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中央红军长征,停止向外发稿,但收报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35年11月,红中社随红军转移到陕北,重新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新闻电讯广播。1936年冬,廖承志加入红中社,当时只有他和向仲华两人。所有外国通讯社如英国路透社、美国美联社、日本同盟社、苏联塔斯社、法国哈瓦斯社等的电讯稿,由外文翻译成中文,通通都由廖承志一个人包了;向仲华则负责苏区的消息。

1937年1月,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红中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社址设在延安,同时将《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离,成立独立的编辑部,受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在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封锁、分割的条件下,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方针,一些地方通讯社发稿存在着分散性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发表的一些言论违反了党的政策与指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开始整顿通讯社的工作,从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决定:

一切党的政策,通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宣达;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广播台及起广播台作用的战报台,划归通讯社管理,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同延安新华社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受延安总社的直接领导;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带有全国、全党、全八路军和新四军性质的文件、电文、讲演,必须事先征得中央同意,否则不准发表于广播。^①

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新华社在中国共产党宣传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把重大新闻的发布权集中于总社,统一了根据地的对外广播,扩大了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形成了统一的通讯系统。

中央要求以全党办报的精神办通讯社,所有消息出口都经过新华社。

1946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党办通讯社”的口号,5月底批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进行了重大改组,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决定“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社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之直接指挥”。^②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54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7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延安，3月18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新华社留小部分人员组成工作队，由副总编辑范长江带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大部分人员由社长廖承志带领，转移到河北省涉县坚持工作，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持续不断和新华社发稿日常工作继续进行。此时《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肩负起通讯社、党中央机关报、广播电台三项职能，成为党中央、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向国内外进行宣传报道的重要媒介。

二、新华社分支机构在战火中扩张

延安的7月，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月份。而1946年7月，不但天气炎热，政治空气也骤然升温。蒋介石破坏停战协议，国民党军队开始对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此前，中央已决定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合并，实行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因为即将爆发的内战将使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更加困难，通讯社是战争中进行宣传的最便捷的工具。于是，“全党办通讯社”，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华社通讯网，成为应对内战的重要战略措施。在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的领导下，首先对新华总社进行了改组，同时在各大解放区组建总分社、分社的体制先后完成，并开始建立特派记者制度和组建前线记者团。

这是在抗日战争之后，新华社为适应新形势进行的又一轮分支机构扩张。

早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红中社就建立了第一个分社——西安分社，这是新华社历史上第一家分社。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抄收陕北总社的新闻和党的一些文稿、宣言，向很多在西安的国内外记者宣传党的精神，扩大党的声音。但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分社很快停止了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新华社在华北、晋绥、晋察冀、山东、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相继成立分社。当时，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新华社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外发布新闻的唯一渠道。到1942年，新华社已拥有五个分社，较大的分社也已经发展成为总分社。

历经抗日烽火的锤炼，新华社有了较大的发展。至抗战胜利时，新华社从一个原来仅有十几人的“窑洞通讯社”，发展成为由设在延安的100多人的总社以及遍布各抗日根据地的9个总分社、40多个分社组成的、初具规模的全国性新闻机构。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重心由原来主要面向解放区转而面向全中国，迎来了自身大发展的时期。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新华社总社内部扩大和充实了编辑部门，分别设立了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等部门，在各解放区建立起了总分社，在东北、冀热辽、华中等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重庆、北平、南京三大城市建立了分社，形成

了“以解放区新闻为基础,进而组织全国的新闻网”的基本格局,为迎接“复杂而艰巨的战斗任务”做好了准备。^①

1946年5月,新华社总社向各主要战场派出随军记者或记者团,以此为基础,一批野战军前线分社先后在部队成立,使得新华社军事报道的力量和组织大大加强。之后,从1948年8月起,新华社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陆续建立前线分社和野战军总分社,在兵团一级建立分社,各军成立支社。

1949年1月,根据战争的发展,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为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3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新华社总社发出《关于野战军各级新华社名称、任务的规定》,要求“现有各野战军各新华分社应即扩充野战军总分社,称为新华社第×野战军总分社,直接与总社联络。各兵团设分社,称某某兵团分社,军设支社”。按此精神,新华社对各军事分社进行了重大调整:西北野战分社扩建为第一野战军总分社,社长由一野政治部宣传部长鲁直兼任,总编辑普金;中原野战分社扩建为第二野战军总分社,社长由二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王敏昭兼任,副社长为缪海稜;华东野战分社扩建为第三野战军总分社,社长由三野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其五兼任,第一副社长陈冰,第二副社长邓岗。东北野战分社扩建为第四野战军总分社,社长由四野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兼任,副社长杨赓。在总分社之下,各辖若干分社和支社。^②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大反攻后,新华社全力投入报道与宣传,总社编辑部还抽出专人负责撰写军事综合报道与军事评论。

7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7月2日,新华社报道刘邓大军渡黄河挺进中原的胜利消息;

9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指出战争形势已发生根本转变。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期间,新华社从多个侧面充分反映了战役的进程、成果和意义,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报道与通讯。在加强军事报道的同时,新华社还充分报道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国内外重要新闻。

1948年,新华社建立布拉格分社和伦敦分社,主要抄收和出版新华社英文电讯稿,发行欧美和亚洲国家,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在国外的影响。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华社拥有20个野战军总分社、独立兵团分社和地方总分社。

^① 新华社2007年2月5日电,载《人民日报》,2007-02-06,第2版。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76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三、进入北平，成为国家通讯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新华社总社随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并根据中央的决定，逐步调整了全国各地的组织，在各大区建立总分社，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分社，在解放军部队中也建立总分社、分社、支社各级组织，努力组建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国家通讯社。

10月25日，新华总社发布了关于部队新华分社与报纸分开问题的指示：

部队新华分社在部队中已有相当时期的历史，为了继续培植它的威信，仍应用新华总分社、分社名义为好，不要用广播编辑部。为部队报纸采访的记者，可由报纸编辑部或由通联部（或改称采访通讯部）管理，新华分社只指挥那些主要是为全国作报道的记者（自然他们的许多稿件同样可以供给报纸用，也是部队报纸所需要的），以便分社能够集中工作的力量。^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新华社改变战争年代分散割据的状况，逐步统一和调整了全国各地的机构，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担负起代表党、政府和人民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新闻的职能。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所属机构设置，确定政务院设立新闻总署，新闻总署下辖一厅（办公厅）、一社（新华通讯社）、三局（广播事业管理局、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一校（北京新闻学校）。新华社作为政务院的下属机构，归新闻总署管辖。

11月27日，新华总社就分社、总分社的关系问题致华中总分社及各总分社电：

……总社已与若干省的分社和兵团分社直接联系，今后还可能与更多的分社直接联系……但分社与总社有直接联系后，分社的日常业务仍归总分社负责领导，总分社仍是总社的代理机关……因此，总分社仍应经常地指导分社业务，随时检查督促它的新闻报道工作，并向总社报告总分社和分社情况。而分社发总社的稿件，必须发给总分社，并向总分社报告工作，请求指示，服从总分社的领导，不能因与总社有直接联系而松懈与总分社的关系，总社如对某一分社直接有所指示，当同时通知负责领导该分社的总分社。^②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 1921—1949），418～41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 1921—1949），42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